

性科学和生殖健康研究

主 编 刘春英 杜洪波
副主编 李 莉 谷守义 曹淑敏
于彩辉 侯 健 郑文武
张振蕊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科学和生殖健康研究 / 刘春英, 杜洪波主编. —
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75-4995-0

I. ①性… II. ①刘… ②杜… III. ①性学-研究②
生殖医学-研究 IV. ①R167②R3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0054 号

性科学和生殖健康研究

刘春英 杜洪波 主编

出版发行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邮编:050061)

印 刷 石家庄市乡依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468000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定 价 48.00 元

《性科学和生殖健康研究》

编委会

主任	杨书文			
副主任	杜洪波	李文平	刘春英	薛静
	谷守义	沈清松		
主编	刘春英	杜洪波		
副主编	李莉	谷守义	曹淑敏	于彩辉
	侯健	郑文武	张振蕊	
编委	杨书文	杜洪波	李文平	刘春英
	周伟文	薛静	田建华	谷守义
	沈清松	李莉	曹淑敏	于彩辉
	侯健	郑文武	张振蕊	武现社
	刘旭刚	雷德相	闫燕晨	杨建中



前 言

“食、色，性也”。性，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涉及每一位公民的整个一生，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职位高低，无论人们的文化、职业、地域有何种差异，无一例外。提倡性文明，促进性健康，既关系到建设和谐婚姻、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又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当前，有许多性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破解、去引导。因此，性科学研究应当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本书收入了河北省性学界论文 69 篇，反映了河北省性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另外，收入了 4 篇特邀稿和 6 篇选编稿，共计 79 篇论文。内容涉及性医学、中医性学、性病及艾滋病防治、古代性文化、性教育、性法学、性科学与计划生育、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等。本书的出版，为性社会学和性医学工作者，为计划生育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书。

在 4 篇特邀稿中，我国著名性社会学家、上海大学刘达临教授一文，反映了他严谨、自我、创新的研究历程，他出版著作 130 多部，开办性文化博物馆，把研究、办展和宣传讲学结合了起来。我国著名性学家、原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史成礼教授，从事性学研究 50 多年，著书 50 多部，现已 87 岁高龄，仍潜心性学研究和从事性病医疗。该文批判了女性“性役文化”，提倡建设性文明。山西职工医学院原院长、性学家朱坚教授一文，总结了开展性健康教育的成功经验，包括原则、内容和方法。中国性学会学术部部长潘晓明博士一文，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视觉，分析了 21 世纪家庭结构及性行为模式的现状，并做了展望。

本书性医学、中医性学、性病及艾滋病类论文 37 篇。对性功能障碍、前列腺疾病、不孕不育症等，进行了综述性研究、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有创新，展现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对性病做了临床观察治疗，进行了检测分析；对吸毒人群、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知识和艾滋病毒感染状况做了调查。

性社会科学包括古代性文化、性教育、性法学类论文 24 篇。分析了古代性文化、古代婚俗等；总结了青春期教育的经验，论述了网络与青少年性教育，青年官兵和大学生性心理健康教育，对大学生的婚姻观、家庭观、生育观进行了调查研究；剖析了嫖娼行为、未成年人性犯罪、女性性犯罪、儿童性侵害者的心理特征及对其干预和防治。

在性科学与计划性育和生殖健康方面收入论文 14 篇。深刻分析了性科学与计划生育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人口科学和性科学同为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总结了开展生殖健康服务的经验。

该书由杜洪波同志和刘春英同志统稿后交由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审定出版。对为本书出版做出努力的各位作者和同志表示感谢。书中如有疏漏和不当之处，请读者给予指正。

联系电话：0311-87755255、15511389829。

编 者

2011 年 8 月



目 录

我是怎样撰写性文化著作的	刘达临 (1)
女性压抑与性役文化	史成礼 (10)
开展性健康教育的实践	朱坚 苗林 (14)
21 世纪家庭结构及性行为模式现状与展望	潘晓明 (20)

中医性学

中医学论女性性功能障碍的病因	刘春英 (26)
阳痿与心身医学	王世颺 (31)
早泄的中医简述	高健 刘春英 (33)
不射精症中医治疗初探	李波 郭连澍 (38)
前列药浴液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临床观察	刘春英 张振蕊 (40)
前列腺炎综合征经络虚实调查	闫建军 李昆城等 (44)
前列腺的中医概念	郑文武 (46)
前列腺及前列腺炎的中医溯源	郑文武 (48)
慢性前列腺炎常用中药规律分析	牛兰志 (51)
前列腺增生症宜忌	张振蕊 刘春英 (53)
现代中医研治不育症的思路和方法	刘春英 (55)
男性不育症治疗的卫生经济学评价	王旭初 窦树正 (63)
中西医结合治疗弱精子症临床研究	王旭初 窦树正 (67)
古代中医论男性不育症	郑文武 (69)
不育症患者精液细菌和支原体检测及意义	李俊平 (73)

性 医 学

环境因素对男性生育能力的影响	杨书文 王亚轩 汪鑫 (75)
精索静脉曲张导致睾丸生精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变化	杨书文 瞿长宝等 (78)
特发性少精子症生精细胞增殖与凋亡变化的研究	杨书文 蔡广增等 (80)
左卡尼汀联合他莫昔芬治疗少弱精子症	杨书文 蔡文清等 (82)
左旋肉碱治疗弱精子症患者的疗效观察	杨书文 王亚轩等 (84)
男性不育症诊断与治疗进展探讨	李文平 郭 铁 马建国 (86)
男性不育症与精索静脉曲张	冯栋栋 李文平 (89)
精索静脉曲张致男性不育机制的研究进展	李文平 孙云朝等 (93)
染色体异常与男性不育的研究	谷守义 刘杰 (96)



精子发生阻滞不育症患者睾丸病理特征	谷守义 王刚 (100)
育精丸和氯米芬治疗少、弱、畸精症的观察	王立红 牛淑斌 沈清松 (103)
糖尿病患者性功能和生殖健康的研究进展	王树松 (105)
卵巢功能与女性健康	徐素欣 (110)
阴茎背神经切断术治疗早泄	王树森 朱凯等 (112)
V-Y 成形阴茎延长术 43 例报告	王树森 朱凯等 (114)

性病及艾滋病防治

电离子治疗 53 例阴茎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田建华 (116)
性病患者衣原体和支原体检测结果统计分析	尹建奇 (118)
多种疾病梅毒血清生物学假阳性的研究	尹建奇 (120)
河北省社区吸毒人群艾滋病知识、行为及感染情况调查分析	张玉琪 (122)
男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知识、行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调查	李保军 (125)
男男性接触者的艾滋病现状及其研究进展	刘淑君 (128)
性传播疾病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米梅艳 (132)

古代性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殖崇拜	田增志 (134)
中国有过试婚	赵晓茂 (139)
催妆的由来与流变	赵晓茂 (144)
伏羲时代性文化探幽	李从勋 (148)
承德磬锤峰性文化博览馆的建设构想	薛云杉 闫燕晨 (155)

性教育

青春期教育制度保障的有益探索	薛静 吴美荣 (157)
如何在护校学生中树立文明、健康、科学的性观念	朱坚 苗林 (160)
网络与青少年性教育	刘偌倩 (164)
加强部队青年官兵性心理教育浅议	盛莉 杨洪训 (167)
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研究综述、评价与建议	王金丹 (170)
河北省在校大学生婚姻观的调查研究	崔庚寅 李萌等 (176)
当代大学生家庭观的调查研究	崔庚寅 李萌等 (182)
在校大学生生育观的调查研究	崔庚寅 李萌等 (188)
大学生性权利偏态分析及其教育	闫京华 杨筱柏 赵霞 (193)
当代大学生性别角色的困惑与思考	薛静 杜玉英等 (198)

性法学

论性自主权与夫妻同居权	于彩辉 付云岭 (203)
论禁止结婚的疾病的范围	于彩辉 王玲 (207)



诱发嫖娼行为的错误心理及自我防治	刘旭刚	范文勇	(212)
性犯罪人重新犯罪的风险因素及其社区监控	李永亚	刘旭刚	徐杏元 (215)
性变态犯罪人的犯罪原因与矫治	邱莎莎	刘旭刚	徐杏元 (220)
未成年人性犯罪的原因及心理干预	孙雪芸	刘旭刚	徐杏元 (225)
女性性犯罪人的心理特征与矫治	刘旭刚	徐杏元	(232)
儿童性侵犯者的心理特征及矫治	沈莉莉	刘旭刚	徐杏元 (238)
性别平等视角下的老年人性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刘卫红		(243)

性科学与计划生育

谈性科学与人口计划生育	杜洪波		(245)
试论计划生育与性教育	孙沐寒	遗作	(256)
再论计划生育与性教育	孙沐寒	遗作	(262)
性教育与计划生育	史成礼		(268)
性科学与计划生育	史成礼		(274)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正定县开展农村妇女两病普查服务结果分析	王会玲	冯美玲	赵志宇 (278)
重组人干扰素 $\alpha 2a$ 栓治疗宫颈糜烂疗效观察	王会玲	冯美玲	马花荣 (281)
药具管理与生殖健康服务	雷德相	高彦平	李彦力 (283)
宫颈癌的早期发现及预防	张丽娟	闫华元	(285)
自拟化瘀止血汤治疗流产后阴道出血 140 例临床疗效观察	张丽娟	闫华元	(287)
谈不育症夫妇的心理压力及其排解	孙巧霞		(289)
青春活力素治疗阴道松弛患者 56 例临床观察	习文有	吴万有	(290)
谈更年期综合征及更年期保健	李莉		(292)
谈老年人性健康	史成礼		(297)



我是怎样撰写性文化著作的

刘 达 临

我研究社会学、性科学已有 30 年了，算是做了一些工作，有了不少体会和教训。廉颇老矣，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工作多久，把这些体会和大家谈谈也许对人文科学的发展有些帮助。当然，这些体会不一定都对，有的体会可能有些特殊性，不一定有普遍意义，那就要请大家鉴别了。

一、研究动机要摆得正

关于研究动机，就是为什么要研究它，我想有 3 个方面要摆正位置，一是责任，二是兴趣，三是名利。

过去，有多次记者问我：“你为什么对性科学、性文化、性文物那么感兴趣？”我说，最初推动我研究性科学、性文化的不是个人兴趣，而是一种社会责任。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社会学，重点研究婚姻家庭问题，那是组织分配给我的专业，谈不到什么个人兴趣。以后，在工作过程中，我发现社会上、家庭里新冒尖的性问题太多，可是，很少有人敢去研究它。我就想，你们不敢研究，我来，因为这是社会需要，颇有一些佛经上所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当时谈不上什么兴趣，也没有什么私心，的确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名啊利啊的念头。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个人想法，那就是搞研究要求新，不要吃别人已经嚼过的馍。当时我已年过半百，如果再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就太晚了。

从那时起的二十几年以后，有人说我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研究性问题是“新的历史时期用胸膛堵枪眼的黄继光式的战士”，对此称颂，我是不敢当的。就算有那么一点相似，那显然不是出自兴趣，而是出自责任。黄继光用胸膛去堵枪眼，是因为对这种做法有兴趣吗？当然不是，那是一个战士的责任。

我想，许多性学同行对此都会有同感的。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带着浓厚的兴趣去干一件事，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兴趣并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应该是社会责任。搞性学研究是有风险的，如果主要凭兴趣干事，就可能不够坚定，经不起风浪；或者有时说话、做事会弄得很邪乎，兴之所至，太过分，背离了社会责任，这方面的人和事我就不多举了。

当然，要干好一件事也不可能没有兴趣，不然，干性学事业就没有快乐，只有苦难啦。我体会到，对一项事业的兴趣绝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它来自对这项事业不断深入的理解，也来自社会评价。哎呀，性文化有那么丰富的内涵，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有这么先进的观点啦。去挖掘它，多有意思！还有一个社会评价问题，如果我们干一件事，社会上许多民众都热烈地支持拥护，那当然越干越来劲了。

至于名利问题，这也是一种工作动机、工作动力。不能自命清高，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对名利没兴趣，这是假的，至少一般人做不到，名利也是社会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



一种反馈与回报，是一种价值肯定，有人崇拜你（崇拜你所从事的事业），追随你，总不是坏事吧？钞票多一些，能改善一些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能在事业的发展上多一些物质资本的投入，不都是好事吗？但是，名啊利啊虽有推动作用，如果把争名逐利作为工作的主要动机，那就歪了。譬如搞建筑，当然要赚钱，可是为了赚钱就搞“豆腐渣”工程，这就太恶劣了。干一件事总得有社会责任啊！再如现在办性文化展览很时髦，干这种事不能不赚钱，否则，怎么维持、怎么发展啊？可是，现在有些人办性文化展，以赚钱为首要目的，那就会办得文化含量很低，搞得很庸俗，我说它是光有“性”，没文化了。

我现在年纪大了，回首往事，什么名啊利啊，都如过眼云烟，实在空得很。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人生在世，总要干一些事情，留下一些东西给社会，给子孙后代，这一辈子不能白活，这就是我的心中那个动力吧！

二、工作要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

做学问有了前面所述的那些动力，就要以全身心投入，全力以赴，如痴如醉，忘我。

有人说鲁迅是个天才。鲁迅说：“我哪是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去了。”数学大师陈景润常常一面走路一面思考问题，有一次他撞上了一棵大树，他竟说：“你撞我干什么？”牛顿当然是个天才，但是，他家养了两只猫，为了使猫能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他竟在门上挖了两个洞，大洞给大猫走，小洞给小猫走。其实，只挖一个大洞就够了。陈景润和牛顿有智力障碍吗？当然不是，只是他们把全部智力都用到事业上去了，所以在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就显得有些“傻”了。

还有一个大科学家，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可能是富兰克林，工作起来，常常一连几天几夜把自己关在一间房间里，谁也不见，家人只是按时在他的门口放些食物和水。我虽然完全不能和这些大师相比，可是对这种因工作而忘我的境界还是能体会到的。当我搞研究或写作时，工作似乎占领了我整个大脑空间，“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早晨一起床就想马上坐到书桌边上去，连脸都不想洗，胡子都不想刮。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最怕有人叫我，打断我的思路，写啊写啊，叫我吃饭了，饭总不能不吃吧，可是从书桌旁边一站起来，才发觉早该上洗手间了。我写东西的时候不太怕周边环境吵闹，常常什么也听不见。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提笔写作，窗明几净，旁边有一盆花，一点若有若无的音乐，一杯茶或是一杯咖啡；因为我不抽烟，所以有一点零食更好。我最怕出现什么行政事务、经济问题来打扰我，可是经营这个中华性文化博物馆烦心的事不断，除了学术研究，要搞公关，搞经济，又不能不管，所以感到很苦，幸亏有胡宏霞博士代我挑走了不少担子。李贽说过：“寸阴足惜，曷敢从容”。我出差，乘长途汽车，乘火车和飞机，住医院，在宾馆里，从来不会感到没事做。要么带一点书看，要么带了稿纸在写，即使不去看书和写字，大脑机器也在不停地转动，一有什么思想火花马上记下来，不要让它溜走。我这几年心脏和腿都不太好，怕走路，可是如果一面走路一面在吟诗作文，几里路不知不觉就走下来了。每个人的时间一天只有 24 小时，可是如果时间利用率高，生命就会是别人的几倍，如果我一天不做什么学问，我就会发慌。我现在年近八十了，依然如此，不过工作节奏没有过去那么快



了，但是脚步是不停的，过去一天写一万字，现在平均一天三四千字吧。“不怕慢，就怕站”。我曾经从军 20 年，作为军人，“何惧马革裹尸还”；现在作为学者，“此身只合讲坛死”，我很羡慕华罗庚，他倒在讲坛上，而不是死在病床上。

当然，人和人的人生观、生活方式、个人乐趣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可是我总认为如果没有一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做学问是做不好的。我不喜欢那种沉湎于打麻将的中青年男子，还有一天要花几个小时去化妆的女人，当然生活方式各有自由，可是至少他们不是做学问的人，也可能不是胸有大志的人。古人说：“诗痴者诗必工，文痴者文必良”。其实，“痴”于一件事也未必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得好，因为做好一件事还有其他许多条件，可是如果不“痴”于此就必然做不好这件事，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研究内容要不断发展、更新

学者的研究各有专攻，也各有分工，可是不能老是停留在一个点上，要不断地发展变化。盯住一点、锲而不舍、深入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如果是这样，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感到发展不下去了，甚至再前进一步都很难了。举一个不一定恰当的譬喻，比如练短跑，从跑百米 12 秒练到 11 秒不一定很难，可是从 11 秒到 10 秒 5 就不那么容易了，到 10 秒 5 以后，可能每提高 0.1 秒甚至 0.01 秒都很困难了。搞学问也是这样，当学术研究到再研究就深入不下去的时候，最好有个转变，转而去研究一个相关学科，则又会找到一个发展原来学科的新路子，有了新的发展，这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也就是文化的“嫁接”，学术研究工作的“嫁接”。

回顾我 20 多年的性学研究，有这几个大的发展与转变：

(1) 20 世纪 80 年代，从研究社会学、婚姻家庭发展到研究性科学，从前期、中期零星地研究一些性问题，发展到 1989、1990 年组织系统的全国两万例性调查。

(2) 通过调查，发现现代中国人的性观念、性习俗、性行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于是又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古代性文化。

(3)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与 21 世纪初，又重点研究了外国性文化。

(4) 中国、外国性文化都研究了，就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华性文化的特点。

(5) 中华性文化的特点又是和中华文化的特点分不开的，所以又研究了道家文化，现在在研究儒家文化和性文化的关系。在对中外文化作了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再回过头来研究中华性文化，似乎体会更深入了。

从以上过程看来这方面的研究正是一浪逐一浪地发展前进的。我并没有事先计划好这么做，但是事情的发展从上一步必然要进入到下一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有生命的学术研究决不能停滞不前。

我办博物馆也是这样，从办展览发展到办固定的博物馆，从办主馆发展到办分馆，从办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发展到办世界性文化博物馆，还想办一个专门配合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馆，也可以办几个性文化的专题馆（如青楼文化馆）。人不发展就完了，事业不发展就死了。



我们搞学术研究，要写书，书是学术研究的成果。书出版了，里面写的都是真理吗？20年前对许多复杂的性问题的认识就已经十分正确、一步到位了吗？我们说学术研究要不断发展，不仅是研究内容要有发展，而且是思想观点要有进步，要不断地修正它、完善它，“觉今是而昨非”，这正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前几年，有一位台湾学者写信给我，他说：“我买了你的许多书，研究你的思想观点，发现你有些思想观点在书上提法不一样，例如在你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中，把同性恋列为‘性变态’；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出版的书中把它列为‘异常性行为’；在近10年出版的书中你把它称为‘不同的性取向’了，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呢？”我回复了他的信，首先感谢他对我的关注，然后告诉他，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也在自我改造，观点的修正、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学术研究哪能“毕其功于一役”呢？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儒家文化与性文化的关系问题。在我20多年的著作中，从来就是认为儒家文化、孔孟之道提倡性禁锢，是性文化的对立面，什么“娶妻必告父母”、“男女授受不亲”、“从一而终”、“存天理，灭人欲”等等。可是这里有个大矛盾没有能解决，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在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两千多年来久盛不衰，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直到今天，在外国还建立了多少多少个孔子学院。这几年在中国研究《论语》、《孟子》这一类的书发行以百万计。但是，性是一种人性，而人性是不可压制、不可消灭的，如果儒家文化泯灭人性，又怎么能久盛不衰呢？这个问题就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研究。结果发现，我们过去忽略了儒家文化在性方面的合理的内核，也没有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儒家文化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形了的孔孟之道。从本质上看，儒家文化与性文化有不少相辅相成的地方，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如果离开中华文化的主流来谈中华性文化，中华性文化就会变成孤立的现象，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我出版过许多研究性文化的书，如果还有机会再写、再出，关于儒家文化的内容又要修正、补充了。

四、要善于使用笔杆子

20多年来，我出版过社会学、心理学、婚姻家庭、性科学、性教育、性文化类的书130多本，深深感到把学术研究成果用书的形式发表出来，固定下来，意义重大。研究成果再好，如果发表不出去，就没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就太亏了。

有的人对我出版了130多本书有怀疑：有那么多书好写吗？一个人怎么能写那么多本书？我想把我的做法谈一谈，朋友们也许会理解一些。

有那么多书好写？是的，书是写不完的，能写多少，要看我们学术研究的思路宽不宽。例如研究性文化这一大类（还有其他许多大类呢），开始时我是写总论性质的，如《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古代性文化》、《20世纪中国性文化》，这些总论性质的书可以以编年史也可以以一个个专题的方式写，还可以以一个个小故事的方式写，如模仿《一千零一夜》的《性文化七十七夜谈》就颇受社会欢迎。有些专题的内容很丰富，可以拎出来专门写一本书，如从旅游角度写的《神州性文化之旅》，从语言文字角度写的《语言文字中的性文化》，结合孔孟之道写《儒家文化与性文化》，还可以写一本书《道家文化与性文化》，等等。



在写中华性文化的同时，或一个时期以后，还可以写外国性文化，例如我写过《世界古代性文化》、《世界当代性文化》，还可以出许多中华性文化和外国性文化作对比研究的书，如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印度、中国与希腊、中国与罗马、中国与埃及等，这套丛书现在也出齐了。还有不少专题，全世界从来没有出版过，如《世界性博物馆巡礼》、《世界性爱邮票集锦》等，这方面的天地实在是宽广得很呢！

对于书的题材和路子，可以打个比方：“一鸭三吃”或“一鸭十吃”。我们去全聚德吃烤鸭，它一鸭三吃，包括鸭皮、炒鸭丝、烧鸭汤。如果发挥创造性，“一鸭十吃”、“一鸭百吃”可以不可以呢？如果把性文化譬喻成鸭子，我看“一鸭百吃”也是能做到的。

写书的角度、路子只是原则性的，而落到具体执笔，资料是决定性的，这么多资料从哪里来？要“厚积”，才能“薄发”，“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到过国内外的许多地方，每去一地，有三件事是非做不可的，一是参观博物馆，二是有什么性文物好买，三是有什么关于性文化的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可以搜集。我喜欢买书，不喜欢去图书馆看书、借书，因为我看书时总要用笔画杠，做做记号，甚至做个资料索引，等我以后写书时可便于查找。我看书报，对有用的资料总要剪下来，分门别类，储存备用。我最喜欢像中药店卖中药的有许多抽屉的小格子，用它来分放资料最合适了。

资料充足，就好像打起仗来兵精粮足，游刃有余。新资料不断地出现，写书也可以不断地求新，而且往往还会从一些相关的资料中涌想出研究的新题目来。但是，写书不能光靠资料，要利用资料，高于资料，否则，如果囿于现有资料而写书，那叫“编”，不叫“著”。那么怎么可以不囿限于现有资料而写书呢？我认为要归纳它，提炼它，通过联想，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看书时会有许多联想，就赶快记下来；写书时一面写一面也会产生许多联想，要赶快记几个字，把它抓住，许多联想是稍纵即逝的，千万不能让它跑了。资料是已有的、人家的，而联想是自己的。光是用人家的东西不算新，有自己的联想才算新。发现了矛盾，钻进去求得解决，才算新，才算是有发展。

我爱写作，写作对我是一种锤炼。我现在很少没有目的地去看书，如果看多了也忘了，没用。把资料编进目录，储存起来了，就成为我的“预备队”和本钱了；写书的时候用上去，这些资料才变成了真正的“战斗队”。一些资料、一些想法写了一遍、两遍、三遍，我才能把它们真正地记住，不是留在抽屉里了，而是留在大脑里，讲课、作报告时随便引用，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所以我体会到，我这二三十年来真正有效的学习，似乎主要不是在看书，而主要是在写作。看书时常常一掠而过，一马溜烟，而写作时可溜不过去，硬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的，非想清楚不可，如果大脑混沌沌沌，似是而非，怎么写啊？所以逼得自己要弄清楚。

我还有个体会：我写书常常不是把提纲、资料准备得十全十美了再落笔，当然仓促动笔也不行，往往准备了七成就可以动笔了。有句俗话说：“打铁没有样，边打边成样”，写作也是如此，写作时常常会自然涌现出许多新的东西来，会自然地理顺了，当然准备得充分些更好。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我写了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以后有一段时间不看了，一旦再看到，常会涌起一股新奇的感觉：“这是我写的吗？我怎么写得出来呢？”

我写作速度快，平均1小时能写一千多字，这也好也不好，不好的地方就是因此我不愿用电脑、学电脑了，加上过多地依赖精于电脑的胡宏霞博士，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个电脑



盲。不少人问我：“怎么可以写得快？”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体会：一开始不要过于咬文嚼字，话怎么说就怎么写。20世纪50年代初部队搞扫盲运动，我们要教一些老兵写文章，总是教他们不要把写文章看得很神秘，你怎么说话就怎么写，如果写不下去了，打咯噎了，就跳过去，再写下面的，这叫“跳障碍”；到一篇文章写完了，再回过头来慢慢地补这些写不下去的地方，这叫“补窟窿”。以上是一个规律，如果一上来就咬文嚼字，字斟句酌，必然写不下去，至少写不流畅，写不快。我写诗也是这样，情之所至，先写下来，以后再慢慢斟酌，咀嚼，修改，好诗必须千遍改。

我想这个道理对其他知识分子也是适用的，我常看到有的学者一写文章就咬文嚼字，写一些半文不白的东西，写写停停，这不是好习惯。我提倡写文章口语化、通俗化，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样写起来不吃力，人家读起来也不吃力，我很反对写学术文章就要板着一副学术面孔，那似乎有点故弄玄虚吓唬人。

当然，有些道理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关键是要多写、多实践，老是在进行条理清晰的锻炼、用词造句的锻炼，多用则熟，熟能生巧。文才提高了，对口才也有好处，文章写好了，思路清晰，用词准确，那么说起话来一般也不会是乱七八糟的了。

还要补充一点是写作要有激情，要有一种“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创作冲动，这样拿起笔来许多话才能喷涌而出，如果写不出的时候就不要勉强写，“挤牙膏”是挤不出好东西来的。

五、基础要厚，站得才稳

回首我的一生，写作能力强帮了大忙，无论是在部队当参谋，还是在工厂宣传科，还是到大学搞研究，都大大地得益于此。过去有人总认为写作是个“技术”问题，“他就是会耍笔杆子”，甚至有些贬义，其实我认为这首先不是“技术”，而是“基础”。

孩子生下来时都差不多，人的能力的强弱，主要不是来自天赋（天赋当然也起作用），而是来自后天的培养，长辈对他的培养、鼓励和期望。有时父母的一句两句话就可能决定孩子的一生，像现在的父母对孩子往往硬逼，对孩子期望过高，恨铁不成钢，有时反而适得其反。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的，记得我9岁那年，偶然地翻译了一首不算太复杂的英文诗，后来居然能公开发表了，还收到一点稿费，这件事纯属偶然，如果没有人注意也就过去了，可是父亲十分看重这件事，他说：“好孩子，你今后如果再发表一篇文章，再得一次稿费，我给你3倍的奖励！”这种态度、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祖父有许多藏书，我从四五岁识字开始有时就翻翻，似懂非懂地看看。祖父注意到了，在我看书的时候常常对我笑眯眯，十分赞赏，还在我的一张放大的照片上题词，上面有“达孙天资聪颖，尤嗜读不倦”这样的话，其实我那时看书还是无意识的，祖父的一句鼓励话实际上是把我爱读书的道路上推。我在少年时代、青年时代读了许多书，所以知识面广，这些方方面面的知识对我一生起了重要作用，而这绝不是逼出来的。父亲和祖父为人厚道，从来不逼孩子。我看到现在不少父母老是训斥、逼迫孩子，不懂得鼓励和诱导，就想起祖父和父亲来，当初如果他们逼我看书、写作，结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现在还有许多家长逼孩子在学校读书要成绩好，学习成绩好的标志是分数高，在班上



名列前茅。回想我过去无论是读中学还是读大学，从总的来说，都不是一个分数很高、名列前茅的好学生，虽然在第一流的学校读书，但是学习成绩总是中等偏上。我不用功，贪玩，但是作文特别好，而这个特点对我的一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招鲜，吃遍天”哪！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学习基础当然要好，知识面要广，但是要有特长，万金油即使再好也解决不了大问题。所以人总要有许多自由驰骋、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逐渐形成自己的特长。现代的父母逼孩子从早到晚不停地做功课，填鸭，拼命往里塞，即使得高分，也会变成书呆子，变傻啦！

回首过去，我深感现在这个社会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太实用主义，只顾眼前，不顾根本，很危险，说不定会害几代人。“孩子啊，你要学好英文，不然不能出国”，“孩子啊，你要学好电脑，不然找不到好工作”，结果呢？孩子的英语啊，电脑啊，学习成绩啊，可能都不坏，可是不少大学生甚至博士生对中国字却写得歪歪扭扭，甚至还不如 50 年前的小学生；不知道秦始皇、汉武帝，而对赵本山、小沈阳却熟悉得很；大学生连一封最简单的公函都不会写；中学生连三加二等于几都要按计算机；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使孩子不懂自控；这样发展会让我们这个民族向何处去呢？

我十分提倡人要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基础，如果基础不牢，那么一幢楼怎么盖也盖不高。在全面的、广袤的知识中，不论是谁，打好人文学科的基础尤其重要。我是搞人文学科的，这么说是不是对人文学科太偏爱、捧得太高了？不是，我国有许多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等等都一再强调，无论是哪一行哪一业，人文学科的基础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涉及人的素养、眼界、思路、品味、理想、道德、情操等等，这些方面的培养和提高要有个长期的过程，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而这些方面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成功还是失败，生存还是死亡。我常常想，一个人如果知识面狭窄，思路不广，思维混乱，连一些简单的道理都表达不清楚，做文学家固然不可能，去做医生、工程师又能做得好吗？现在有许多学校不重视对孩子历史啊、文化啊这些方面的培养，在不断地制造技术好、素养差的下一代，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偏向。

这里还要谈谈性文化和性教育。我国从 1988 年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正式颁发文件在全国各个中学推广青春性健康教育到现在，已经 20 多年了，这 20 多年效果如何？我不理想。不久以前，我国一位著名的妇女工作、教育工作者陈一筠公开地说：“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性教育”。此言一出，舆论为之大哗，而我是赞成她的这个评价的。目前我国对青少年性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只把它看成是一项知识教育，而很少把它看成是一项人格教育，这当然和思想阻力、社会的文化发展不高大有关系。其实，性问题人人都有。按照费孝通的说法，性是最激动人心的、是可以使人不顾一切的一种力量。它和人的理想、观念、道德、情操等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关系实在太大了。现在在我们这个实用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不重视对下一代的文化素养教育，在性教育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我看报纸看到这样的新闻，例如 15 岁的少年嫖娼杀人，两个男女中学生跳楼自杀殉情等等，常常十分感慨地想，这些孩子即使学习成绩再怎么样名列前茅，又有什么用呢？

六、学者要有“商人”头脑

没有经济头脑，是我最大的缺点，是我教训最多、付学费最多的地方，不断地痛定思痛，又不断地犯错误，真是有许多切肤之痛要提醒同行警惕啊！

我们生活在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学术研究不能不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对学者来说，总是比较清高，总是重视文化而不重视经济，总是受了一些“君子不言利”的影响，有些耻于谈钱。可是，又怎么能躲得开钱的问题呢？搞学术研究，总要经费吧？怎么收入、又怎么支出呢？这里的名堂实在太多了。我们要和许多商人打交道，他们奉行的是“在商言商”，“商场无父子”，“有奶就是娘”，“无利不早起，有利盼鸡鸣”。在这种环境里，学者稍不小心，就要吃大亏。我们常常以好心忖度人，可是对有些人来说，我们即使以十颗坏心也想象不出他们会干出的坏事来。

我们办博物馆、办展览，要面临许多经济问题。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稍一不小心，就掉进别人设置的陷阱中去了。我有两次，几百件展品、文物被人骗走了，用尽了“白道”和“黑道”的手段才把它追了回来。所谓“白道”，就是公安局，所谓“黑道”，就是找朋友，耍手段，以毒攻毒。

这些情况也许都有特殊性，一般学者不一定会遇得到。那么对多数学者来说，总要写书、出书吧，签出版合同、定稿酬的支付方法、选出版社都大有讲究。有的出版合同中也有陷阱，我就上过当，出版合同变成了卖身契，以后追悔莫及，打官司也难打。不过在多数情况下，人家并没有欺骗，是自己无知，无知也要吃大亏。例如1993年我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古代性文化》，出版社很看好这本书，问我要稿费还是要版税，随我，我一算，稿费有3万多元，在当时是很不少的钱了，而版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要了稿费。后来这本书卖了10多万本，如果要版税可以拿四五十万元，可是我只得了我应该得、可以得的十五分之一，这怪谁呢？以后我就懂得要版税了，可是要版税也大有讲究，因为出版社和出版社不一样，有的出版社发行工作做得好，有的则做得不好，这差别太大了。现在一本书卖十几万本的很少，我的书第一次一般印刷发行1万本左右，如果每本售价40元，版税率10%，则一共可得4万元。可是有的出版社可以卖3万本，那么可得版税不是4万而是12万了，一念之差就损失8万元，这是个不小的事了。如果这本书有可能几个出版社都要，那么为什么不选择一下呢？我们许多学者往往不选择，哪个出版社愿意出自己的书了，就引为知己，甚至感激涕零，什么经济问题都不算了，其实，报酬也是一个人和他的劳动成果价值的体现，为什么不算一算呢？

还有，学者有时还会被社会某单位邀请讲课，或是去电台、电视台做节目，这里又有个报酬的问题了。这种事我遇到过很多，别的学者可能也不少。20多年来，国内外有不少单位请我去讲课，总是优礼有加，可是少数单位有点欺负人了，如2007年上海有个保健集团请我去讲课，最后连讲课费、礼品什么也没有，这实在是对人的劳动太不尊重了。2002年湖南省电视台请我和胡宏霞去做节目，从上海赶到长沙，风尘仆仆，工作了几天，到临走时，什么也没有，只是电视台一个女工作人员送我们去机场时说了一句：“刘教授，你来了好几天，我们的同事都说你像玉树临风。”我想，就算“玉树”也是需要浇水的吧！还可以补充一点，为了做这个节目，湖南电视台从北京请来一个有名的节目主持人，这个人很



自以为是，牛逼哄哄，信口开河，素养很差，完全不懂性文化，最后听说电视台还付了他几万元。这种对比、反差实在太大了。这种事不仅发生在我的身上，也发生在许多中国学者的身上，因为这些人好面子，因为这种人不懂经济，于是有些人就可以欺负他们，无偿地占有他们的劳动，低价地收购他们的学术成果。

怎么办？学者自身不便于赤膊上阵去问：“你邀我讲一堂课付多少钱？”但是这个问题可以让助手、学生、同行、经纪人去问，甚至可以订一个协议。这种做法在文艺圈、影视圈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在学术圈还不普及，不过今后一定也会普及的。不久前，听说李银河订了一个规矩，新闻单位找她采访，不超过时间不收费，如果超过了，加一个小时要付500元。有人对这种做法颇有微词，我倒觉得她还是敢做敢当的。

在中国的商品大潮中，涌现出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不少企业家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他们有眼光，善用关系，敢干，有决心去干，没有什么温情，不讲什么面子，心不软，自我防护力强，这都是他们成功的一些主要原因，也是我们文人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我们的社会已是商品经济社会，文化必须和经济结合起来，不然，就文化讲文化是没有出路的，我在这方面已经付了许多学费了。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懂文化的商人，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懂商业、有经济头脑的学者，这都是将会产生的一个历史进步。

作者：刘达临，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华性文化博物馆馆长，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性学家。

女性压抑与性役文化

史成礼

人类文明的历史首先是女性的历史，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性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妇女的地位被掌握经济命脉的男人取代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从神圣的主导地位降到了被奴役的社会阶层。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受到了歧视。男人剥夺了女性昔日创造世界主体的功绩，女性心理压抑，创造力受到制约。男人还从生理上否定了女性的性权利，把女性当做繁衍人类的活机器，当做满足男性泄欲的工具。因而女性的创造精神受到压制，她们失去了往日的自尊、价值和心理支撑，于是，性压抑便产生了。

一、性压抑的来龙去脉

从创造文字之初，“妇”字是将“女”与“帚”组合而成的，“女”字草写就像女人跪在地上的状态，古“婦”与“掃”字形似。“婦”字寓意则是一个女子拿着扫帚劳动。“妇”音同为“服”即“服从”。（说文）解释为“妇，服也”。（白虎通）更深刻地解释“妇者，服也，以礼服从”。这充分表明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职能和地位。在奴隶社会，奴隶主有权广纳姬妾，所有的女性都是他的性对象，处女是奴隶主的泄欲工具，因而有“占有权”、“开苞权”和“初夜权”。视妇女为玩物，主张“夜御十女”、“多交少泄”可以养生。“采阴补阳”、“还精补脑”可以延年益寿。为宫廷服务的“房中术”及发明的媚药、春药和壮阳药，制造的各种性具都是为奴隶主提供性享乐服务的。尤其创造出各种性技巧，以女性体位的改变为依据，供奴隶主取乐，如古印度的“六十四内功”，某些宗教的“神圣方式”、《华营锦阵》的二十四法、《避火图》的“气七十二法”、《素女经》中性技巧，仿效动物性交方式的“九法”，充分表现了歧视妇女的思想和无视妇女女性本能。

封建社会，妇女在神权、族权和夫权三种枷锁下生活，强行“缠足”，使妇女身体受到摧残；沦为“娼妓”，人格受到污辱；“童养媳”、“指腹为婚”使妇女丧失人身自由；妇女一旦嫁了人，要“从一而终”；丈夫去世则要“独守空房”即“守节”。皇帝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和后宫佳丽三千人，为皇室服务的男性也要“去势”（即宫刑）割去生殖器官，是为“性霸权”。达官贵人可以三妻四妾，为所欲为，有权“性榨取”。妇女在性生活上无主动权，性欲不能正常发挥，女性的自然本能受到压抑，产生性冷感，性欲减退，性感缺乏，高潮丧失，心理和生理都受到极大的挫伤。

二、女性性压抑的恶果

长期性压抑必然导致强烈的性冲动，轻微的冲动会导致心理疾病，严重压抑会发生难以控制的犯罪心理，从而发生强奸和性骚扰，影响到一个人社会道德品质，所以，从社会学角度看，性压抑不仅是心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性压抑产生的性饥饿，会使精力不集中，工作积极性下降，心理焦躁，脾气变坏，性